

“大历史视阈下的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常文相

为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掘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内涵,准确把握“中国之治”的现实方位,2023年3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大历史视阈下的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分为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历代治理、世界变迁与中国治理几个专题,旨在以宏观通贯的视野融会古今中外,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术资源,搭建国家治理研究平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等机构的五十余位学者,就大历史时空情境下国家治理的逻辑、原则、机制、方式、经验、影响等议题展开交流讨论。

一、深入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治理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入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治理经验,探寻当代“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是本届论坛一大亮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治理成就,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武力《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经济关系再认识》,用详实数据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积淀的结果,中国由此开启了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龚云《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应着重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本质和要求,继续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恢宏史诗。

党的治理探索,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证与体制建设。穆兆勇《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与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考察了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成就和经验,认为必须把党的全面领导更好地贯彻落实到新时代国家治理中。王红艳《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性问题》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发展协商民主应将提升协商主体的意识与能力作为工作重点。

除优化制度顶层设计外,党在理论创新及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亦与时俱进,建树卓著。樊锐《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的文本分析》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平安《中国国家治理的文化遗产与时代主题》主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应当遵循中国自身发展规律,坚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与推陈出新,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储著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重申,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极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总之,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正如宋儒《从“救民水火”到“人民万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灾害治理的现代转型》指出,党密切联系群众,将“民”转化为具有能动作用的治理主体,建立起新型灾害治理机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价值基础和力量源泉,也是其长期执政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长时段、多维度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

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梳理分析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脉络、效能及特质,汲取借鉴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和教训,是本届论坛的重点。

本专题与会论文主要从治理思想、治理制度及治理实践三个角度加以考量,卜宪群《中国治理的历史底蕴与现实方位》的发言,可谓为整个讨论确立了基调。他强调中国治理体系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保持长期延续和强大韧性的重要根基,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李大龙《如何诠释中国历史——在“历史上的中国”讨论基础上的新思考》一文,则为中国治理的历史区域范畴划定了基本框架。他由“整体性”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和“边疆”共同构成的“天下”才是指称王朝疆域的概念,更适合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民本”“德治”“大一统”作为中国传统主导治理思想,不仅展现出强烈的人文理性精神,更有力维系了中央集权体制运作,影响广泛深远。左玉河《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其民生实践》强调,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历代统治者虽关注民生、重民养民,但本质上为巩固政权服务,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因而必须进行近代转型。冯立《帛书〈易传〉中孔子治国理政思想考》指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易传》反映了以“德治”为首要根本、以仁政爱民和尚贤用能为主要措施的治理思想。靳宝《国家治理视野下的“王霸之辨”》申明,王道与霸道是关乎古代国家治乱兴衰的一对重要理论范畴,由此形成“霸王道杂之”理念,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治国原则。常文相《天下为公:“德治”走向“法治”的历史底蕴》通过考察“天下为公”的历史含义及演进路径,认为其最终经过近代“民主”精神的洗礼,推动实现治理思想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换。赵现海《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思想渊源》表示,在内聚性地缘格局下,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围绕如何治理国家展开积极探索,从而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演成奠定思想基础。董家宁《峰山刻石与秦始皇封禅——兼论秦对齐鲁文化区的整合》提出,秦始皇通过以“祠邹峰山”为开端的一系列巡行祠祀行动,将东方不同地域信仰悉数纳入“大一统”秩序之中,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天下”。

可以说,上述为政理念正是在与国家权力的耦合互动中,演生出古代中国较完备的制度体系。郭培贵《论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现实启示》指出,科举选才的客观公正性大大提升了国家政权的公信度和合法性,成为朝廷凝聚社会、巩固统一、普及文化的得力工具。李鸿宾《制度化建设与唐朝多族群国家兴盛局面之转成》从职官、科举、财税、军事、法律等方面,探讨唐朝制度化建设的含义、内容、实质及对后世的影响。李玉君、孔维京《“岳镇海渚”封祀与金代正统形象的塑造》认为,金朝对岳镇海渚的加封祭祀是塑造“正统”形象、增强文化认同的表现,同时也推进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交融。牟学林《思想逻辑与历史本体:以中古监察制度史研究为中心的反思》主张,由监察视角切入是中国古代御史台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但作为近代思想产物,其与历史本体之间仍存在某种程度的互异性。

围绕国家和社会关系,历史上的中国从朝廷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又演绎了一幕幕治理实践图景。袁宝龙《西汉中后期边疆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强调,西汉宣、元之际“有为”政治瓦解,“夷夏之辨”重新成为主流思想,边疆治理相应呈现新变化,见证了西汉王朝的盛衰急转。彭成义《大历史观下〈盐铁论〉中汉匈通绝之辩新探》主张,《盐铁论》议题涵盖对匈总体战略、国家安全、边境安全和边民体恤等,核心是处理汉匈关系,内中透露的“文衰则武胜,德盛则备寡”的警示足以令人深思。王瑞来《宋代国家治理的地方样相——以富弼、赵抃切入的考察》谈道,任职地方的宋代士大夫面对灾荒瘟疫,不仅显示出传统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意识,还表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与聪明才智。展龙《明代“集议”决策机制与“民主”共治模式》认为,群臣集议是明代议政决策的主要路径和关键环节,一定程度体现了国家政治决策的审慎态度和“民主”色彩。黄阿明《明代文官考满资格与久任、骤迁》表示,明代文职官员考满既遵循又不拘泥资格,久任与骤迁成为当时政治场域中的重要话题。吴滔《明代漕运“运法三变”新探》指出,明代自永乐朝开启了从支运到兑运的漕运改革进程,运军成为漕粮运输主体,同时军民联运格局也掺入更多经济因素。王健《再论明清以来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的互动》提出,明清江南地方家族以各种方式把自己塑造成“神的后代”,构成了家族与神灵关系的另一重面貌。

三、对清代以降传统王朝国家治理之现代演进的积极探索

处于帝制晚期的清代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王朝国家传统经过这一时期的积淀、嬗变而呈现最终样态,并整体投射到后来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对清代以来国家治理演进历程的研讨在本届论坛中占有相当比重。刘仲华《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清代北京城市功能与治理效果》提出,政治优先的功能定位极大塑造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路径和治理特色,直至晚清北京的城市治理才逐步向近代转化。刘文鹏《重骑射还是重火器?——清代南苑大阅的历史意义透视》指出,清代皇帝虽始终强调保持骑射传统的重要性,但火器部队在历次大阅中都占据主力地位,提示了对其时武器近代化迟滞的另一种思考。李典蓉《冀投诚以平乱:清嘉庆朝广东沿海“洋盗”治理问题》认为,嘉庆年间清廷恩旨招安,使得沿海各省洋盗案的司法审判不能划一,疆臣扩大了对重大盗案的司法裁量权。刘晨《洪秀全的思想与太平天国社会治理方略之构划》认为,洪秀全构划的是一个充分体现尊卑等级又洋溢手足亲情的理想社会,但不断强化的皇权主义也为太平天国最终败亡埋下伏笔。刘增合《零和逻辑与治理困局:晚清“隐匿财政”管控的纠结》表示,晚清户部秉持零和思维汲取行省财源,如何管控地方隐匿不报的财政收支是当时治国理政的主题之一。韩策《北洋南洋一线牵:甲午战争前后争夺直督和江督的政潮》指出,甲午战争后实政改革以及戊戌变法至庚子事变的政局演进,都与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的人事嬗变密切相关。张建斌《“有私党而无政见”——端方与上海舆论治理研究》谈道,端方采用灵活策略管控报刊舆论,双方呈现多样化的互动和调试。卢树鑫《同光时期台湾公费改革与州县治理困境》表示,同、光之际台湾地方政府为筹集经费介入州县财政,引发了各级官府间的利益纷争与博弈。章成《西北辛亥革命与晚清西北治理体系的终结》结合新见末任陕甘总督长庚档案,展示了辛亥大变局之下地方与国家多维互动的另类格局。

总体来看,与会学者自觉运用综合、贯通的眼光审视历史上国家社会运行及其与现代治理的关联,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佟大群《“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清代

《东北经略研究》认为,应将清代东北各领域历史要素视为一个整体置于更高维度的国家治理时空坐标中,剖析其对清王朝乃至后世中国“长治久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赵庆云《从士绅到乡贤——地方精英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在梳理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尝试找到重塑乡贤传统以促进当今乡村善治的合理路径。何玉红《法律分析·政治解释·文化构建——“故事”研究的三种路向》则表示,既有“故事”研究可概括为法律分析、政治解释和文化构建三种路向,有效借鉴多学科理论方法,进而构建中国“故事”话语体系,具有广阔学术前景。

四、世界变迁视野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近代以来的中国,既保持了自身文化传统,又融入世界格局变迁。借助中西比较视角,更有利于看清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特性与时代价值,从古今世界历史变局中考察中国国家治理是本届论坛的特色。

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于沛《历史的选择:世界大变局中的国家治理》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启迪、新机遇、新模式,要努力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融合起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中华民族应有贡献。相较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鲜明的治理特点和优势。柯马凯(Michael Crook)《中西文化差异与大国治理——中国式现代化》,以亲身经历对比中西方因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治理机制,呼吁国际社会应相互尊重,开展对话,寻求共识。事实上,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根源是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蒋重跃《理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认为,诸如中央集权制度、天命民心观念、天下为公理想、平民社会结构等要素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归根结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吴英《从唯物史观看大国兴衰的终极原因》重申,唯物史观揭示了大国兴衰的终极原因,即:国与国之间生产能力的差异,决定着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关于如何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阿格申·阿利耶夫(Agshin Aliyev)《“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阿塞拜疆高等教育合作策略》提出,要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创建中阿高等教育合作新模式新平台。李明诚(Uzodinma Chinenye Gerloj)《非洲孔子学院发挥公共外交功能的比较研究》,从语言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对华合作关系等方面,对非洲四个国家的孔子学院发挥的公共外交作用进行了比较。黄畅《新时代尼日利亚视阈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指出,尼日利亚学者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丰富了非洲的中国学研究内涵,为形成本民族特色发展道路提供参考。于富(Yusuf Opeyemi Fadairo)《大历史视阈下的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国家治理》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有效利用媒体拓展公众传播途径,增加全球影响力。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格局,侯中军《一战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考察(1911—1949)》阐明,中国参加国际联盟开启了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大门,其后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又夯实了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历史基础和法理基础。高国荣《前车之鉴:中国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资源保护运动》指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环境破坏的报道总体较为客观,旨在警醒民众汲取教训,推动联邦政府介入环境保护,也促使中国直面环境问题。

此外,关于如何理解西方治理的历史文化渊源,卢兆瑜《从中世纪到近代西方“国家软实力”来

源的变化》提出,“知识与学术”构成了近代西方世界文明标准、文明比较意识、“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基础。吕厚量《帝国早期罗马史叙述传统的希腊化与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史观的思想渊源》表示,早期基督教史家对罗马历史的批判性叙述间接继承了希腊文罗马史著述中的“普世史”视角,从而为全面否定罗马政权崛起的历史进步意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届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主题明确,内容充实,气氛活跃,创见迭出。与会学者形成如下共识。一是强调要以贯通性的宏阔视野、跨学科的多维视角、重现实的人文关怀,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动态演变进程中考察国家治理问题,为当代“中国之治”提供参考借鉴;二是注意凸显古代治理和现代治理、中国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内在联系,树立真正的“大历史观”;三是着力拓宽国家治理史研究领域,争取在方法和范式上实现突破,由此阐释中国道路,构建中国理论,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

(作者常文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交流与纠葛——两千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秦汉至晚清)》

孙瑜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39万字。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交往源远流长,均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日关系事关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事关世界局势的变幻与走向,因而从古至今的中日关系史研究至为重要。该书具有五大鲜明特点。一是论述时间跨度大,上起秦汉,中经历朝历代,下迄清末的辛亥革命,跨越两千余年。二是全书内容范围广,涉及中日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和军事冲突。三是突出重要人物的历史作用和重要事件的历史影响,包括隋炀帝、苏定方、鉴真、阿倍仲麻吕、忽必烈、戚继光、丰臣秀吉、大久保利通等历史人物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角色,以及白江口战役、鉴真东渡、忽必烈征日、勘合贸易、戚继光抗倭、日本侵台、清末留日运动等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四是兼采中日史料,相关注释千余条,各类参考文献数百篇,便于学界同仁或史学爱好者查阅或探索。五是积极吸收中外最新学术成果,为中日关系史研究和妥善处理中日现实问题,提供了历史智慧和学术启示。鉴于此,该书值得学界重视。